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建构(1949 ~ 1956)

王子蘩

[摘要]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特殊之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先夺取政权再进行国家建设,制度变革在前,意识形态建构在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政党接受和国家接受两个过程。建国初期意识形态的建构,完成了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并轨。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构面临着历史和现实的难题,任务复杂而艰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有效的路径,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历史启迪我们: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充分显示执政业绩,在国家发展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初期建构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1)05-0011-05

国家建构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同步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期表现十分明显。从1949年到1956年的社会转变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建构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最大限度地寻求社会制度在广泛范围内的政治认同,使执政党的路线、方针、远景成为人民的共同期盼和价值取向。恩格斯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社会生存的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对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①建国初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验证了它对于形成和确立新中国社会制度认同的重要功能。

一、意识形态建构的两个层面:政党与国家

制度变革与意识形态建构都属于上层建筑范围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制度变革之后,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执政党不可或缺的任务。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观和思想体系,反映和表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并以特定的道德观念加以强化,以达成共识、消弭纷争,具有政治整合、制度合法性支持以及政治社会化的作用。经验表明,任何一个谋求发展的国家,不仅需要依靠坚强的政治领导、民主与法制的完善、经济的健康发展,更需要全体社会成员思想上的稳定。正如马克思·韦伯所指出的“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②这段话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维系经济发展对于国家统治的稳固是远远不够的,制度合法性信仰的建构尤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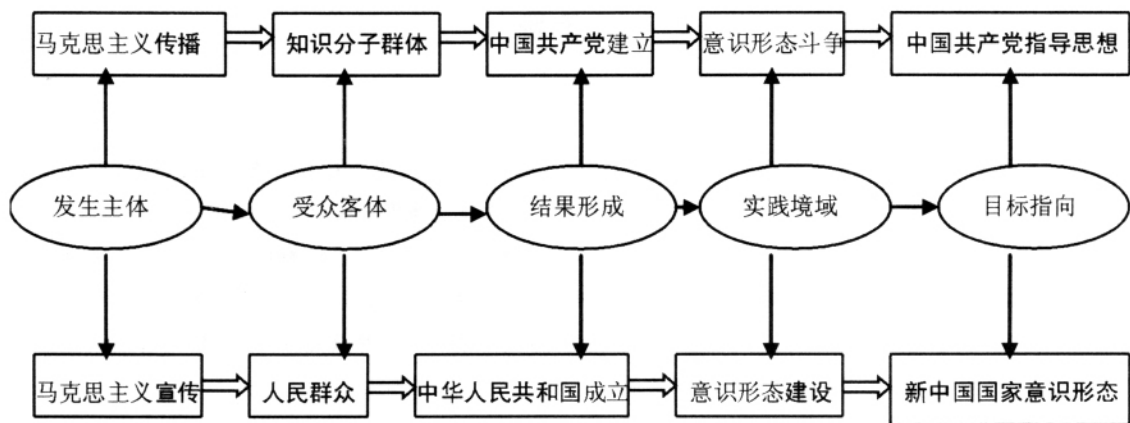
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特殊之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先夺取政权再进行国家建设。这就决定了制度变革在前,意识形态建构在后的实践顺序。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制度变革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9页。

^② [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页。

义,民主革命胜利后,将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发生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两次落脚生根的行进路线,一次表现为政党接受的过程,另一次是国家接受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上的建构不仅表现着时间上的交错,而且也有内容上的不同。

图 1 政党接受过程和国家接受过程



以上两个路线图中,黑体字标示的部分表明了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意识形态建构在主体、受众、结果、境域和指向上的差异。从政党接受过程看,“主体”的传播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最初的输入,“受众”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结果”为先进政党的诞生,“境域”表明马克思主义处于同反对势力斗争的遭遇,“指向”是政党的思想指导地位。从国家接受过程看,“主体”的宣传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形成气候,“受众”面向所有群体,“结果”为新中国的诞生,“境域”表明马克思主义进入建设的阶段,“指向”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目标。这些差异说明,政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构虽然有着紧密的关联,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建立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旗帜,政党接受构成一个在斗争环境下树立指导思想的历史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证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成功,将政党层面与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相统一,是执政党的不二选择。

二、建国初期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难题: 历史与现实

政党与国家两个层面意识形态的并轨,既有着实践的可能,又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的执政党,对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建国初期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战略任务又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内在要求。然而,国家层面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构面临着历史和现实的难题。

历史的难题来自于对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生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 30 年左右的时间。这 30 年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始终十分激烈,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并非完全陌生,但却存在着严重的思想接受障碍。首先,中国共产党大部分时间处于“地下”、“秘密”的“非法”地位,使马克思主义不具有正常的宣传条件。虽然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出版,一些杂志上也发表相关思想理论的文章,但流传范围主要局限于党内一部分人和少数进步知识分子。其次,国民党政府以及其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势力恶意污蔑共产党“主张‘共产’、‘共妻’”、“提倡暴力恐怖”,肆意攻击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不适合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妖魔化,制造了人民害怕和恐惧的心理。中国革命胜利之前,“宣传马列主义是被禁止的,而且禁止得相当厉害,只要哪个人在街上讲一句‘拥护马列主

义’喊一声‘打到帝国主义’就会被抓到监牢里,甚至有杀头的危险”^①。由于这两方面的历史原因,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可以说是在零起点上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如何建立人民的思想信仰从而为制度合法性提供支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现实的难题来自于建国初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多元。五种国民经济成分的构成和多个革命阶级的社会结构是意识形态建构难以回避的现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社会客观现实的反映,不同的阶级有着各自的思想取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国家意识形态建构所需遵循的原则。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对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带来严峻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事实和奋斗目标,决定了国家意识形态决不能搞多元化,政治信仰和思想取向的不统一,必然造成人心涣散的格局。基于意识形态一元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多元的矛盾,党在建国初期就确定用马克思主义引导人民政治信仰和思想取向的基本原则。“必须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教育人民”,“确立马列主义即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巩固与加强这种领导,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孤立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允许存在,不算非法,但指出这些是错误的思想”^②。坚持一元的指向和承认多元的合理,显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科学态度。

建国初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意味着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毛泽东对此有较为冷静的判断:“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③。1957年3月,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曾有一个估算,按当时全国6亿人口的百分之一比例,知识分子就有600万,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和抵触马克思主义的都不到十分之一,“两头去掉,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还是大多数。他们中间,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④。他还指出“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部分人不要苛求”^⑤。这里且不说这个估算是否准确,毛泽东交出的这个底令人深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先接受的是知识分子,建国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建构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们的思想信仰状况举足轻重。现实表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基础十分薄弱。

三、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启动与路径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向国家意识形态的嵌入从建国之初就开始启动。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是标志性的工作。1945年党的七大上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铸就了毛泽东兼全党领袖与全国领袖而一身的角色和地位,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兼容需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1949年5月,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就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发出了“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指出“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⑥。为了满足全党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特别是毛泽东著作的要求,1950年5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以中央名义编辑一部具有权威性的《毛泽东选集》在全国发行^⑦。1950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发行,第一批总量超出60万册。1952年4月、1953年4月第二、三卷相继出版,“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全国得到广泛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②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1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25~226页。

⑥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

⑦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的传播,对于中国人民的思想变化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①。

新中国建立后党的建设首先一个举动就是提出“公开建党”,这就向社会发出了结束“秘密状态”的讯息。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建立宣传员和报告员的制度,在“一切全民性的宣传运动中”发挥作用^②。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的指示》,提出“统一和加强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的任务,指出“我们党是领导着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党,必须经常向各界人民正确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目前的各项主张”^③。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和认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清理旧思想是建国初期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路径之一。“立新”首先要“破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的旧思想不加以批判和清除,马克思主义就难以获得意识形态的生长空间。《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④,虽然没有明确揭示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旨意,但点出了清除旧思想旧文化的目标。中共中央对改造旧电影、旧戏曲等文学艺术作品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开展了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从文化教育领域入手,肃清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扫清障碍。建国初期思想批判运动接连不断,如围绕《红楼梦》评价问题开展对俞平伯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等等,虽然今天看来有失当之处,但这些运动的发生则都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路径依赖。这些批判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局限性与时代合理性,构成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复杂局面。

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建国初期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又一条路径。早在1938年中共中央就在延安设立马列学院,由张闻天兼任院长。1948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仍沿用马列学院的名称,由刘少奇兼任院长。创办马列学院的目的是培养党的高级干部。建国初期,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出发,马克思主义学习从培养党的干部向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一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系科的设立,从基层干部中选拔进大学学习、短期速成班等等措施的出台,都具有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意义。1952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指出“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之后,极需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而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课理论课程的教学水平,则是学校思想建设工作的中心环节”,并提出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各大行政区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创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在高等院校配备政治理论课程助教或助理等具体措施。^⑤高等院校以及其他学校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普遍开设公共政治理论课,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项重要举措。

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是建国初期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再一条路径。建国初期思想改造涉及的面很宽泛。1950年开展了以大学教师为主要对象,兼及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1952年1月,全国人民政协发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同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报告,此后一段时间里,一场被称为“洗澡”的思想改造运动普遍开展起来。据有的学者研究,参与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的全国高校知识分子占教职员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第14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7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页。

工总数的 91% ,大学生参与人数占总数的 80% ,中等学校教职员参与比例也达到 75% ,绝大多数小学教师也参加到思想改造运动中。^① 此外 ,诸如文艺界的整风、对俞平伯、胡风、胡适等人思想的批判 ,都具有思想改造的意义。

表 1 高等院校及各类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相关文件一览

时 间	文 件 名 称
1951 年 9 月 10 日	教育部关于华北区各高等学校 1951 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课教学工作的指示
1952 年 9 月 1 日	中共中央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
1952 年 10 月 7 日	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
1953 年 2 月 7 日	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关于确定马列主义基础自 1953 年度起为各类型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一年以上)二年级必修课程的通知
1953 年 6 月 17 日	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关于改“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和重点的通知
1954 年 7 月 1 日	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关于工、农、医二年制专修科二年级开设政治理论课程的通知
1956 年 9 月 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

通过以上主要的路径 ,建国初期国家意识形态完成了建构的任务。1957 年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②。从 1921 年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到 1949 年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意识形态建构实现了政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并轨。这既是思想发展的逻辑 ,也是政治发展的逻辑。

四、余 论

研究建国初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 ,有助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意义。坚持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统一 ,决不搞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着眼政治思想共识和制度合法性认同 ,推进意识形态建设 ,正确处理国家意识形态一元化与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关系 ,维护主流思想与非主流思想的健康发展 ,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 ,是建国初期意识形态建构留给当代中国的有益启迪。值得指出的是 ,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建构起来 ,是与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出色的执政业绩密切相关的。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民生的改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等等 ,与旧中国战争频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的场景相对照 ,为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地位提供了有效的支持性资源。历史为我们显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充分显示执政业绩 ,在国家发展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基础。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止 耳]

① 于凤政《改造——1949—1957 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01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第 231 页。